

一百年前的

曹鸿涛 王净 飞廉 张婷如 ○ 著

当我们将“80后”这样一个富于当下色彩的词强加于宋教仁、谭延闿、蔡锷、蒋百里、鲁迅、熊十力等人头上时，不免要引发一些相隔百年的遥遥对视与对比。如果说这样的强加行为有一点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套用一个流行的词说，它是“励志”的。他们至少让我们看到，人类在向个人能力极限挑战中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自觉的。

80后



江苏出版集团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一百年前的 80后

曹鸿涛 王净 飞廉 张婷如 ◎著

当我们用“80后”这样一个富于当下色彩的词强加在宋教仁、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熊十力等大人物头上时，不免要引发一些相隔百年的遥遥对话和思考。如果说这样的强加为有一点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套用一个流行的词说，它是“励志”的。他们至少让我们看到，人类走向能力极限挑战中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自觉的。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百年前的 80 后 / 曹鸿涛等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8

ISBN 978-7-80715-751-9

I . ①— … II . ①曹 … III . ①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IV .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7455 号

一百年前的 80 后

曹鸿涛 王净 飞廉 张婷如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关俊红

照 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751-9

定 价 29.00 元

网 址 www.zjguji.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篇：为何天才成群而来（代序）

在收录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中的《傅斯年与陈寅恪》一文开头，王汎森先生便抛出了人类学家克罗伯（Kroeber）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天才成群地来（Come in a cluster）？他所指的这个天才成群而来的时代，是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而这个问题显然也适用于 19 世纪 80 年代出生的那批人。1911 年，当那场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每个中国人命运的辛亥革命爆发时，这批人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在急剧动荡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英雄与乱世总是结伴而至，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百姓生活来说，这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如今我们已经与那个英雄和天才辈出的年代相隔一百多年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弹指间逝去，白杨作柱，红粉成灰，那些人的笑傲风云、金戈铁马、千古风流，都已尘烟散尽，只留下一串供后人追思的名字。

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天问已经持续了上千年。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免要想起茨威格那段被引用了无数遍的名言：“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我们有理由相信，辛亥革命就是这样一个决定了一个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而一百年前的那些“80 后”们，便是闪耀在这一历史天空中的群星。

亦如茨威格所说，当我们目光聚焦在 1911 年时，我们同样不能忘记的是那些无谓流逝而去的漫长时光以及那些时光里无数的生命。在撰写这部书稿的时候，我们自己常常会惊讶于这些英雄与天才的成长史，诚如李叔同对马一浮的评

价：“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之多。”所有看过这句话的人大约都想问，那么马一浮是怎么读书的？这样的疑问我们几乎可以指向每一个一百年前的“80后”，或如李叔同所说是“生而知之”，或如荣格所说，这是一种被遗传的“集体无意识”，此外，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当我们将“80后”这样一个富有当下色彩的词强加于宋教仁、谭延闿、蔡锷、蒋百里、鲁迅、熊十力等人头上时，不免要引发一些相隔百年的遥遥对视与对比。如果说这样的强加行为有一点现实意义的话，那么套用一个流行的词说，它是“励志”的。他们至少让我们看到，人类在向个人能力极限挑战中所能达到的一个高度，虽然这种挑战并不一定是自觉的。

同时，这不是一本一百年前的人物小传。所有的人物命运都在围绕辛亥革命展开，如上所述，虽然在一百年前，并非每个人都与那场革命发生直接关系，但辛亥革命改变了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他们都是在大革命的背景下生活与成长，他们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那场革命成败的缩影。从这个层面上说，这本书更是在一百年后对辛亥革命的一次小小的反思。

目 录

开篇 :为何天才成群而来(代序)	1
政客卷 :奈何江山已唱晚	1
谭延闿:和气春风生眼中	3
黄 鄂:惟闻白云何处去	10
宋教仁: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16
载 津:只是近黄昏	26
汪精卫:世变无穷东海涸	32
蒋介石:东来志岂在封侯	42
行伍卷 :乱世豪杰已成梦	53
蒋百里:光芒使敌胆为寒	56
蔡 钔:万里间关马伏波	65
阎锡山:一角山城万里心	73
尹昌衡:世乱谁忧国,双泪落秋风	82
汤芗铭:功过是非汤屠夫	90
王亚樵:北顾延河非孤云	95



文人卷：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104

李叔同：从今一担好山河 105

鲁 迅：怒向刀丛觅小诗 112

马一浮：白云无尽是儿孙 119

刘师培：竟是筹安会里人 126

周作人：不堪故国歌禾黍 134

熊十力：世间已无熊十力 142

黄 侃：亦庄亦谐真醇儒 148

钱玄同：谈笑深时风雨来 157

刘文典：疾恶真推祢正平 162

红颜卷：不把双眉斗画长 169

吕碧城：任是无情也动人 171

徐蕴华：沧海月明珠有泪 181

何 震：美人何处隔潇湘 188

宋靄龄：苔花如米学牡丹 196

政客卷：奈何江山已唱晚

没有一个群体像政客那样，个人命运与时局变幻紧密相连，尤其在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风云跌宕的年代，当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内忧外患中大厦将倾，无人可在政治生活中闲庭信步。与当下时局的周旋，对未来的忧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权衡，维新与守旧，改良与革命，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将政客们推向选择的十字路口。

与此伴生的是时刻可能发生的暗杀事件。

1910年元旦，北京琉璃厂附近一家名曰“守真”的照相馆开张了，几个年轻人心不在焉地张罗着生意。那时照相还是件时髦的玩意儿，这家小店的年轻人都是留日的“海归”，就像如今有志青年一样，选择在京城创业。可是这几个年轻人开照相馆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所创之业则是为国为民的千秋伟业。这几个年轻人便是同盟会会员汪精卫、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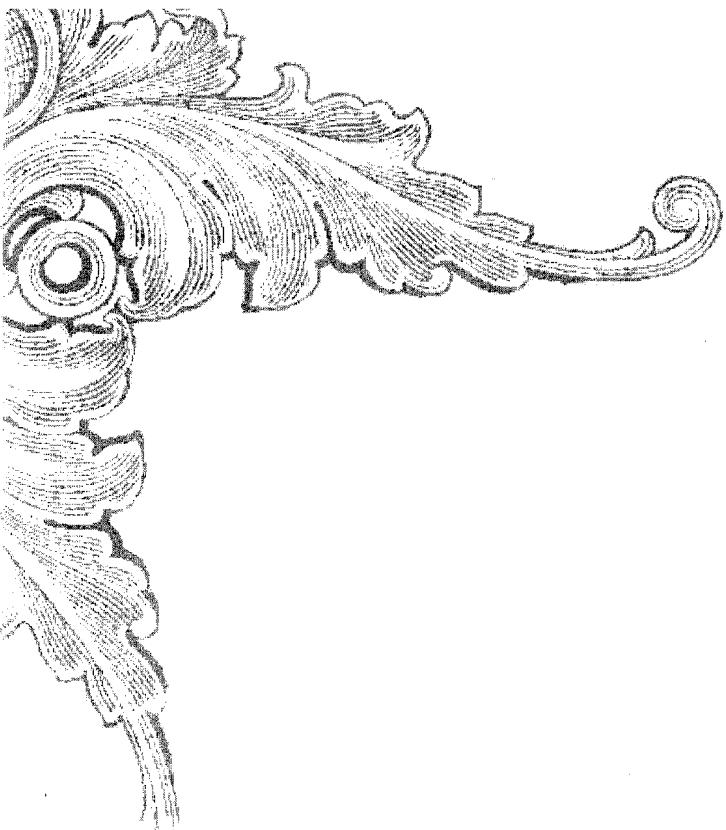


复生、喻培伦、陈璧君等人，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暗杀此时清帝国的真正掌权人、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此时的载沣与汪精卫同龄，不满二十八岁，执掌着千疮百孔的清帝国，正如前朝崇祯皇帝所抱怨的一样：“朕非亡国之君，尔等是亡国之臣。”还算新派的载沣挡不住历史的车轮，不过他没有像崇祯皇帝那样想不开去上吊殉国，他在去职之后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宋教仁的命运显然就如载沣了，他没有逃脱被暗杀的命运。1913年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声枪响，让这位伟大的宪政民主实践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两日后的凌晨，他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二岁。这位生于1882年的湖南年轻人，来自一个耕读的殷实之家。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文普通学堂，在那里接受新思想，进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其间恰巧同乡黄兴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少年宋教仁与之一见如故，两人联手在1904年创办了华兴会。为革命起事，宋教仁变卖家产。事泄后，他无奈亡命日本留学。1905年他又与黄兴一起和孙中山商量成立同盟会，让华兴会整体性加入同盟会，他则成为了司法部检事长。

同是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汪精卫和蒋介石则成为日后国民政府分裂的两个最核心领导者。即便是后来亲日卖国如此的汪精卫，在少年时的爱国激情也是不容否定的，然而他与蒋介石，却在经历了较长的合作后分道扬镳。

载沣、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他们大约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新旧体制里最典型的几位政客代表了。



谭延闿

和气春风生眼中

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组安、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县人。民国初年政治人物，曾任湖南都督、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其父谭钟麟为清封疆大吏。谭延闿长于诗法、书法、枪法，绰号“谭三法”，与陈三立、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1904年中进士，二十八岁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后与时偕行，支持立宪；辛亥鼎革，又赞成革命，追随孙中山；后与汪精卫合作；又与蒋介石结盟，直至逝世。他广交游，有“药中甘草”之誉；能治军，曾多次领军征讨，有“翰林将军”之称；善书法，为民国颜体第一人，时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喜吟咏，著有《组庵诗集》《慈卫室诗草》《非翁诗稿》等。

人，无不为其所处时代、时局之影响，此之谓历史局限性，历史人物鲜有能超越者。因此，历史人物往往呈现复杂的面貌，令人琢磨不透，这也给时人、后人评价的多元性打下了基础。这种多元评价与盲人摸象很是相似，侧重于对“象”之侧面的片段式体验，至于“象”之全貌依然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多元又片面式的评价的好处之一倒是增强了被评述人物的传奇性。作为著名历史人物的谭延闿即是这一代表。

(一)

吃，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而且早已超越了口腹之欲而发展成了一种文化和雅趣。远的不说，单说清代就有李渔和袁枚两位吃家。前者在《闲情偶寄》里专辟饮馔一部谈吃论喝；后者为了吃还专门写了《随园食单》一书，此书成了烹饪史上的重要著作。近代的梁实秋，当代的陆文夫，也在操弄文学之余而成了鼎鼎大名的美食家。尤其是在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不是多而繁，而是少而精，色味俱全。

谭延闿是有吃的资本的，他的家境颇好，父亲谭钟麟是晚清重臣、封疆大吏，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立下赫赫战功。谭延闿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那个时代都是高人一等的，这也有力地“赞助”了他的口腹之欲。出身名门的谭延闿在父亲的身边也历经了不少风云，走南赴北，闯东荡西，见多识广，闻吃见喝自然是不少。据记载，他自己曾经说过，“吃喝嫖赌，人生四大嗜好，嫖赌与我无缘，吃喝在所不辞”。话是有点粗俗，可能是谈起吃有点过于兴奋了，但其一番言辞却也道尽了对于吃喝的喜爱。

谭延闿喜欢吃、讲究喝，到了什么地步呢？据学者刘建强的记载，说他曾经专门带了一个厨子在身边，以满足自己的口欲。一个人能带一个厨子在身边供自己随时使唤，这首先说明了他的经济条件不是一般的好，其次说明了他对吃喝的嗜

好与挑剔。其实，能带个厨子在身边的人肯定不止谭延闿一个人，因此，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他的这个厨子名叫曹四。曹四原名曹荩臣，本是清朝衙门的官厨，在烹饪上是有两下子的。况且这位曹师傅又是个好钻研之人，常常烧好菜后就躲在帘子后面偷听主人和客人对菜肴的评价，并留心按照主客的喜好与要求下次改进，所以他烧出来的菜非常出名，什么红烧鱼翅、蟹黄鱼翅、笋泥、鱼生等，光看菜名即知，不仅是贵食，也是美食，更是巧食。这位曹师傅擅湘菜、通粤菜，对江浙菜也有研究，因此找他烧菜的人络绎不绝，吃他菜的人无不是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到谭延闿家任专职厨师并不是曹师傅唯一的选择，在当时他只要在湖南任何一个地方开一家饭店或者酒楼，生意都应该是兴隆异常的。但这位曹师傅毕竟曾在官府里面当过差、见过世面，他有着自己的考量。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能得到社会名流谭延闿的欣赏，这对于他来说，有一种特殊的肯定和荣耀；况且谭家社会地位高、经济实力强，在报酬上自然不会少，更重要的是他也会身价倍增。因此，为了满足谭延闿吃的爱好，他在菜式上几乎是花样不断翻新。据学者刘建强记载，有一道叫“神仙鱼”的菜是谭延闿的最爱，此菜在做法和工序上十分考究：先用锅子炖好土鸡汤，然后将一条鱼悬挂在鸡汤之上，并将锅子和鱼密封好，用细火炖上四个小时，以鸡汤之蒸汽将鱼肉蒸熟，并使鱼肉一点点掉进鸡汤里，如是直至鱼变成空骨架为止。此种做法虽然繁复，但味道鲜美至极。对于喜欢吃的人来说，吃先不说，单是想想过程，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享受。

关于谭延闿对美食的耽迷，有一个流传更广的故事。据说有一次胡汉民请客。作为多年的同事，胡汉民深知老友有好吃鱼翅的习惯，于是在宴会之前大谈鱼翅味同嚼蜡。鉴于此，在点菜的时候，谭延闿就避开了鱼翅，没有点。宴会到了一半，谭延闿实在是熬不住没有鱼翅的饭菜，于是转向胡汉民，幽默地说：请来一盘“嚼蜡”如何？胡汉民及众人大笑不已。此事真假有待考证，也许这是人们为了表现谭延闿好吃喝而刻意附会的。但既然有人去附会，也恰恰表明被附会者多少是具备这样的特点的。

1930年，谭延闿去世的时候，那位名叫曹四的厨子据说还请人代写了一副挽



联，以表达自己的怀念与哀痛，联曰：

趋庭退食忆当年，公子来时，我亦同尝甘苦味；
治国烹鲜非两事，先生去矣，谁识调和鼎鼐心。

(二)

黄埔军校大门的校名上有这样几个字：“陆军军官学校”；南京中山陵的石碑上刻着以下几个字：“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这两个重要建筑物的名字都是谭延闿题写的，当然，能题这些字者不仅仅要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更要紧的是字不能太差。

谭延闿的书法是相当出色的。在民国，他与胡汉民、吴稚晖、于右任并称“四大书法家”，而且排在首位。四位各有所擅，胡隶、吴篆、于行草，而谭延闿独在楷书上造诣奇高。他学的是颜体，有观点认为，“民国至今，学颜者无出其右”。如果说这个观点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来自于右任这位行家里手的专业肯定就比较靠谱了，他曾直白地说：“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至于谭延闿的书法成就到底如何，书界早已有定论，笔者不妨做一次文抄公，引用一段专家的文字：

字如其人，延闿书法大权在握之气象，结体宽博浑厚，气势顾盼自雄，乃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位颜体大家。颜真卿楷书自宋代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再被重视，故而宋、元、明三代，未有一位颜字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之一统天下。直至清中叶，刘石庵以及钱沣、何绍基、翁同龢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以草书见长，篆隶也颇多好手，但循规蹈矩之楷书尚不多见，因楷书最能显示真功夫，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钱沣已是一时名家，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之书仍罕有其匹。延闿三十岁后致力颜书，借鉴钱沣、何绍基笔法，终生浸润，遂以名世。……而至民国，

延闿书坛成名，至今写颜字仍无出其右者。四十岁后，涉笔行、草、篆、隶，其中行书广取黄山谷、苏东坡、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诸家之法，俊迈豪放，洞达自在，宽博温情，于雄浑博大中更有清气弥漫，既以得力于颜真卿、钱沣、翁同龢，晚年则稍参米芾笔意，卓然兀立于民国书坛。延闿虽翰林出身，但其书法中却无“馆阁”之气。而同科状元刘春霖，写得一手漂亮的“欧底赵面”的“馆阁体”。后论为官，延闿远胜春霖，论书法，延闿亦大胜之。延闿学书，自有主见，深得颜书“峻拔宽博”之神髓。后又吸收刘墉“以搭锋养势，以折锋取姿”，进而领悟钱沣楷法结体，雍容端庄而无呆板凝滞。由于延闿既能入古，又能出古，泥古而能化，所以被于右任称之为“有真本领”。谭延闿书法广博，取翁同龢“天骨开张”之意趣；且未拘泥于“颜体”之宽厚，参以米芾之洒脱倜傥，入钱南园而能出，得其长而弃之短，从而熔铸出自身风范。观延闿行书，貌丰骨劲，味厚神藏。用笔线条潇洒，笔意沉着，颇为清雅飘逸。晚岁尝致力章草，亦能入室。擘窠榜书、蝇头小楷，莫不兼擅。作书喜用硬毫，好以极硬之毫写扇面，乃追踪唐人之笔趣也。

谭延闿的书法成就来源于自己的天赋与勤奋练习，也与他的父亲谭钟麟分不开。这位晚清重臣曾因目疾之故而休假在家，那是一段难得的父子相聚的好日子。父亲除了教孩子们作文外，每天也亲自监督着延闿、泽闿小哥俩练字，每次练完字后，父亲总把自己认为比较得意的作品，拿给友人看，让友人也来指点一二。这友人中就包括翁同龢——同治和光绪两代帝王的老师，清朝著名的书法大家。据说在一次看过谭延闿的书法后，翁同龢颇爱之，曾对谭钟麟说：“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这种来自长辈的指导和夸赞令谭延闿受益匪浅。同时来自兄弟之间的竞争和切磋也令谭延闿进步巨大。他的弟弟谭泽闿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其书法功力及成就不在乃兄之下，民国时南京“国民政府”匾额以及《文汇报》报头均是谭泽闿所书。书法出名后，向谭延闿求墨者渐多，而谭延闿给人写条陈的方式也别具一格，有资料记载：“他写字的方式不一定要明窗净几，往往或坐或立，随处拈笔即书。有时躺在藤椅上，令人牵纸悬空，也能一挥而就。”



(三)

旅者不以结果为目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路上，他们更加看重过程本身，很少在某个地点长期逗留。作为政治道路上的旅者，谭延闿同样具备这一特点。纵观谭延闿一生，他很少在某个政治驿站上纠缠，总是能不停地往前走：他二十八岁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后与时偕行，支持立宪；辛亥鼎革，又赞成革命，追随孙中山；后与汪精卫合作；又与蒋介石结盟，直至逝世。在他个人看来，每次的转向都自然、顺畅，但这却也正是他为人所诟病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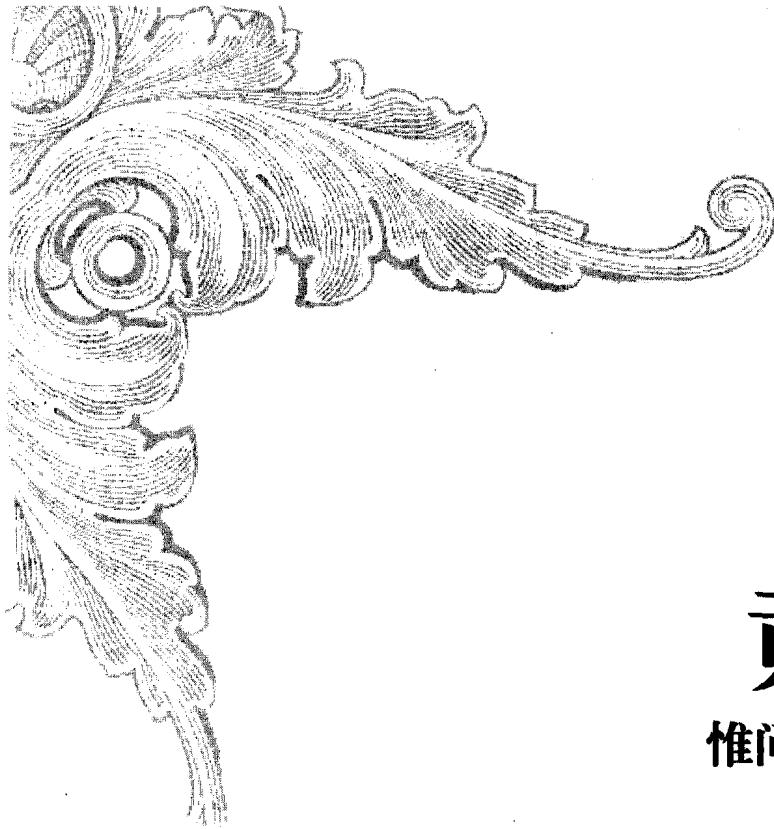
1930年他死后，上海某不甚出名的小报刊登了一副对联，联曰：

混之为用大矣哉！大吃大喝，大摇大摆，命大福大，大到院长；
球的本能滚而已！滚来滚去，滚入滚出，东滚西滚，滚进棺材。

这一副对联就是专门为讽刺谭延闿而作。在他一生中，有许多绰号，其中有两个是“混世魔王”和“水晶球”，前一个说他是政治混子，后一个则点明了他在官场上八面玲珑的性格特点。此联的上下两联的第一个字加起来就是“混球”二字。这分明是一个恶评，读起来刺目，听起来刺耳。倒是他的老朋友胡汉民表达得含蓄委婉却也不失准确。胡汉民赞誉他为“药中甘草”。所谓“药中甘草”，是源于“朝中国老，药中甘草”这一说法，一般认为甘草主要起着调和诸药的作用，是一种调和剂，以此引申为“好好先生”之意。关于他八面玲珑的一个著名例子就是1926年当蒋介石就国民政府是否迁都的问题询问他时，他给了这样一个回答：“论道理是应该迁武汉，论局势是应该留南昌。”其两面都不愿得罪的心态昭然若揭。其实当时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谭延闿这样的人倒是真少不了。据说他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始终抱着“三不原则”：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每次开会他总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自己则是闭目养神，偶尔点点头，时间一到，马上散会。这样，难免不让人诟病。其实这些都不过是谭延闿的官场生存哲学罢了。

他的生存哲学还体现在另一件事上。据说，当年孙中山很想把自己的小姨子宋美龄许配给谭延闿，宋母已经同意，宋本人也同意了。那时谭延闿已经丧妻，可是他却坚决拒绝了。至于原因嘛，说是谭延闿是个十分重感情的人。喻血轮在《绮情楼杂记》中记载说，当年谭妻因为难产歿于沪上之时，谭恰好在湖南忙于驱逐张敬尧，因此未及诀别，等到妻子棺柩回湘时，他却又因程潜之逼而远走，当舟过城陵矶时，彼此相左，于是他当即有“生者死者，背道而驰”的痛语，发誓一生都不再纳妾。所以，他以“故人情义重，不忍再双飞”的诗句，拒绝了宋美龄的美意。但谭延闿毕竟是谭延闿，他并没有把一件好事完全变成坏事。事后，他成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月老，成就了二人的婚姻，自己也与宋美龄成为干兄妹，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密了。失去婚姻，获得友谊，真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黄 鄂

惟问白云何处去

黄鄂(1880—1936)，浙江绍兴上虞人。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别字天生，笔名以太。曾到日本留学，从而结识蒋介石、张群等人，后跟随蒋介石等人搞革命。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1928年5月3日，北伐军进占济南，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事后时任外交部长的黄鄂被蒋介石免职顶罪。1933年奉蒋介石之意，黄鄂在华北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遭到全国民意所指被迫辞职。1935年托病避入莫干山，过起了所谓“读书学佛”的“隐居”生活。1936年9月，复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12月6日，因肝癌病逝于上海。